第一章　淮阴城里的童年

十里长街姓万的原来是周恩来的舅舅家·国民党县政府同我小时看过的书上画的地狱很相似·抬了课桌向楼下扔，以为就是破坏旧世界



一个人的命运是这么决定的：在什么时候，遇见什么人，做什么事……

（1996 年摄于家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救 国 之 路

1914 年 4 月 18 日,我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在江苏淮阴县（今淮阴市）城内的一个小康之家。

小时候，我的父亲做过秘书、文书之类的职员。祖父留下几十亩田地的遗产。全家的生活就靠父亲的薪金和地租维持,而父亲是经常长年赋闲在家的。

我的家原来住在城外的广东会馆。我的祖籍是广东梅县。祖父这一代搬到城里，在靠近西城根的行台后巷租了一宅砖墙草苫的房子。这房子有两个院子，前一个院子是房东刘奶奶家住的,后一个院子较大,北面有五间朝南的正房,中间是堂屋,两侧是卧室，我就是在西侧一间房子里出生的。西厢是客房，也有我读私塾时的书房，东厢是厨房和佣人的住房。在正房和西厢之间种着一株高大的常绿的黄杨树， 还有个花坛。

我四岁开蒙。父亲给我请了个塾师，教我念书写字。第一天教我认的和写的是“公正和平”四个字。以后，每天写字外，念《三字经》、《百家姓》,长大些,念《幼学琼林》、《四书》、《五经》等。

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家庭和塾师灌注的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做官,荣宗耀祖”。

行台后巷有十几户人家。当官又有钱的家宅是鲁家花园,家人出入有专备的轿子。其余除我的家称得上小康能临时租轿子或雇人力车外，其余都是贫困户。在巷子西面到城墙之间住着

一二十家赤贫的棚户，经常听到他们啼饥号寒、打架吵闹的哭骂声。这些人家的孩子蓬头垢面，衣不蔽体，家人叫这些孩子为“野孩子”，不准我和他们接近。我除去探亲戚、听到门口有小贩的叫卖声到门口买点绿豆丸子或者胡椒辣汤什么的之外，整天足不出户。

这里虽然不能说是旧中国的缩影，但总是旧中国的一个旮旯，反映着社会的不平和人民的苦难。

我的家是一个封建的樊笼。我从小就是这笼中的小鸟，被关禁了差不多七年。

离家不远，有个小学校。我偶尔看到有些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和比我还小的小学生早上背着书包上学，下午放学回家，自由活泼，十分羡慕。我终于忍不住，要求父亲让我上小学校，祖母是个读过书的人，也帮我说服我的父亲，在我八岁那一年，考上了小学一年级。

那里有思想开朗的老师，有活泼可爱的同学，有窗明几净的教室，有清洁美丽的校园。我飞出樊笼，到了一个新的天地。

这个学校，是江苏省立第六师范附属小学。

我于 1922 年初八岁入学，1927 年底十四岁毕业。

这时的中国，正是受帝国主义掠夺、被封建军阀割据、人民受苦受难的年代，也是中国共产党刚诞生、第一次大革命兴起又失败的年代。

对于这些，我在童年，知道得太少。

我们学校的主事（校长）李更生，是苏北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在每周星期一早晨的周会上，都要向全体同学进行爱国的和做个好学生的教育。初小级任老师徐子长，高小级任老师刘建功，还有教历史、地理等课程的老师胡慕遽，在讲课中也

都贯彻着爱国的教育。我多次听他们讲：就在我出生的第二年，卖国贼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是我们必须洗雪的国耻；外国人污蔑我们为“东亚病夫”，上海法国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的牌子，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人不能忍受的侮辱；我国地图像一片鲜嫩的海棠叶，正在受列强的蚕食；有人说中国是“一盘散沙”，我们四万万同胞要团结起来；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只睡狮，我们要把沉睡的国人都唤醒；……我在初小三年级，参加过一次全校的演说竞赛，讲的题目是：《我爱菊花，更爱中华》。那时我还不懂得怎样救国，但已经懂得做个中国人一定要爱中国。

我在小学时代受爱国主义教育最深刻的有两次，都是在1925年。

一次是在3月，孙中山逝世，全校举行追悼大会，老师指定我代表初小学生演讲。我参考了老师在校刊《童灯》上发表的文章，打了一个腹稿就上台讲了。我用“乌云滚滚，恶浪滔滔”形容当时国家的形势，引用孙中山最后的遗言“和平……奋斗……救中国”，表示我们长大了，一定要秉承“国父”的遗志振兴中国。

一次是在6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之后，有些苏北籍大学生到苏北各地宣讲。一个来到我们学校，讲了工人顾正红被日本人杀害的事件，讲了南京路上英国巡捕向示威群众开枪造成血肉横飞的惨状，讲到惨案中牺牲的十几个同胞中有两个大学生，还有一个十六岁的中学生。讲到愤激处，他咬破手指用鲜血在一块白布上写了“还我血债”四个大字。他愤怒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我热泪盈眶，热血沸腾。第二天学校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我也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爱国运动。

以后两年，听教师讲过什么“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军北伐”,又讲过什么“宁汉分裂”“国民党清共”等等,老师讲得含糊，我也听得不大明白。那时苏北还在军阀孙传芳的统治之下，讲这些是有杀头危险的。1927年快放暑假的时候，盛传北伐军快打到苏北了，有些同学秘密相告，在东门外十里长街有个姓万的人家，秘密出售《中山全书》。我急不可待地悄悄去买了一套，如获至宝。

在多少年之后，我和周恩来谈话，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淮阴，他告诉我他是两淮人：出生在淮安，长大在淮阴，十里长街姓万的是他的舅舅家。

我躲在家中书房里，贪婪地反复地读《中山全书》。这部全书有四本，除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纲等部分外，我特别注意读了《兴中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兴中会是孙中山于1895年在国外组织的第一个反清救国团体。《兴中会宣言》中有一段话，我能背得出来：“夫以四百兆人民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本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纲纪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地刮民，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列强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见效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我边读边想，激动万分，这个宣言是在我出生的二十年前发表的，而今中国的黑暗和受欺凌、受压迫，不是有些地方竟依然如故吗？我又读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知道自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情况没有多大改变，“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他们“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现今革命的目的，是要“改造中国”，“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变而为独立的中国，以屹立于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界”。

我认为这正是救国之路。

1927 年 10 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淮阴，军阀孙传芳的部队被打跑了。这时我还曾一度兴奋过。这是我在小学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正加紧用功。当时我还不知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些事，不知道国民党蒋介石已经背叛革命，不知道第一次大革命已经遭到失败。

十五岁：第一次被捕

1928 年秋，我考上了江苏省立淮阴中学初中一年级。这个学校就是由原来第六师范改成的。

学校里有一间不大的平房，门口挂着中国国民党区分部的牌子。几个高中师范部的同学经常出入于其间。这几个人原来都是穿的布衫、布鞋，后来有的做了国民党县党部的委员，有个姓石的男同学，很快换上了西装革履，戴上了金丝眼镜，有个姓朱的女同学，很快戴上金戒指，穿上高跟鞋，神气十足，飞扬跋扈，俨然成了新的贵族。更可恶的，是他们在一次学潮中捣乱破坏。这些引起许多同学和我对国民党的不满。

第二学期，我和同班同学周泰和（现名周太和，八九十年代在国务院体改委工作，曾任副主任）、华湘寿（华泽涛，七八十年代曾任淮阴市政协委员，已故）筹划，想办个油印的刊物《晨钟》。因为借不到又买不起钢板和油印工具，没办成。高中师范部的同学很活跃，已经办起了几个墙报还有油印刊物，其中一个叫稚鸿社，筹办油印刊物《稚鸿》，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正在征求社员，我们三人就分别去报名参加。

1929 年 8 月 1 日,上午 9 点，稚鸿社开成立大会。没想到，开会不久，就有几十名武装警察把会场包围。有些同学跳窗子跑了，有 13 个人当场被捕，我在其中。一同被捕的，有高中师范部同学钱御官（大会主持人）、田遇春、张守廉、姜振发、方运坤等，初中部有陈延禧、顾超、华湘寿和我。我们先被拘留在公安局，傍晚又被押解关进县政府的拘留所。

中午，我的一个表哥到公安局探视和送饭给我，趁看守不注意的时候，告诉我，驻军十三旅司令部要把我们押解到他们那里，那是个危险的地方；经几个被捕同学的家长找地方士绅说情，已说好把我们送到县政府，转到地方法院处理，那就好办了。

县政府拘留所的三面是高墙，一面是木栅栏，阴暗、潮湿，地上铺着破烂的草席，臭气熏人。已经有几个先来的犯人蜷缩在那里。我们进去，也各人找了一席之地，躺下了。蚊虫叮，臭虫咬，难于入眠，由于一天太紧张，太疲倦，也就不知不觉睡着了。

关了四五天，一天半夜，狱卒大声把我们叫醒，一个一个地提审。两个狱卒押着一个人，在黑夜中摸着弯曲的小道，长长的走廊，先到候审室，再到审讯堂。堂上，前面正中的桌案后边，坐着县长郭大荣还有书记官，两边各站着一排狱卒。墙边放着各种刑具，还有一个个上面画着老虎头中间写着“肃静”、“回避”字样的木牌。灯光昏暗。这简直是一个阴曹地府的场面，同我小时候看过的一些书上画的地狱很相似。过去看到这种画，常有些毛骨悚然，现在身临其境，倒不觉得可怕，只是惊奇 为什么在 20 年代国民党的县政府里竟然还有封建时代帝王残害人民的地狱？

郭大荣问了我的姓名、年龄等等，反复问我为什么在 8 月 1 日这个全国戒严的日子开会。我说不知道什么戒严。当时我确实不知道 8 月 1 日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举行南昌起义的日子，也不知道过了两年国民党还要在全国戒什么严。

个别审讯结束后，又叫我们十几个人从候审室里一起集中到堂上，横排成一行，听训话。郭大荣原是坐着的，这时站了起来，破口大骂共产党，叫我们不要受它利用，还说要我们讲什么“礼义廉耻”等等。我边听，边在心里生气：你们乱抓人，冤害人，这有什么礼？什么义？你们刮民脂民膏，公行贿赂，还有什么廉？什么耻？因为表哥探监时私下告诉我，家里已拿钱买通，会把我们转到法院处理。我已心中有数，知道这次审讯只是走形式罢了。

第二天，钱御官等四人被转移到法院的拘留所，我们其余的人交保候传。交保候传就是要我们各找一家殷实的铺保，保释出去，在法院传讯的时候，随传随到。我外祖父在城里开了一爿小杂货店，一个警察把我送到店里，外祖父在保单上签字画押盖章，我就获得自由回家了。

我为获得自由而庆幸，又怕父亲责骂而忐忑不安，父亲家教是很严的。我敲开家门，走进堂屋，父亲躺在藤椅上。我叫了一声“爸爸”，他以慈祥的怜爱的目光注视着我，问我的身体怎么样，被捕后受到什么折磨。接着他说古来革命是受人尊敬的，他讲了明朝东林党人和清末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一些事迹；“不过，”他说；“你年龄还小，以后还是要好好读书，不要参与什么政党的事。”我表示同意，为的是能让我继续上学读书。

开学，我进入初二。华湘寿的父亲不让他上学了，班上就是我这样一个特殊的学生，每隔两个星期，接到法院的一次传

票，要请半天假，去受审。在侦察庭上，法官每次都翻来覆去地问：怎么参加稚鸿社的，做过些什么事，是不是准备暴动，或者听说过什么人准备暴动。对于准备暴动的提问，我坚定地说没有，事实上这也是莫须有的事。就这样，审讯了七八次，到最后一次，宣布判决：钱御官和另一个高中同学被分别判处两年和一年徒刑，我和其他同学交保释放。后来我收到判决书，那上面写着对我的判决是：“年龄不满 16 岁，免予刑事处分，判决无罪交保释放。”多少年以后，知道当时法院的推事长吴煜恒从中帮了忙，他那时是个秘密的共产党员。

这时是 1929 年 12 月中，我离年满 16 岁还有四个月，难道我年满 16 岁就该受刑事处分吗？这是我在童年一段难忘的经历。在北洋军阀时代我上学读书还是自由的，为什么国民党来了国家变成这个样子呢？两年前我从《中山全书》中读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以为从此找到了救国的道路，怎么国民党的黑暗、专制、野蛮，比旧军阀还厉害呢？

我曾经对国民党寄予希望，此时已经完全失望、绝望了。中国究竟怎么办呢？我困惑，我苦闷，我彷徨。

我在交保候传和受审期间，在宣判无罪释放以后，脑子里常常想：国民党自身这么黑暗专制，贪污腐败，为什么它要如此刻骨仇恨和坚决反对共产党呢？它所反对的，会不会倒是一个比它好的能够救中国的党呢？我这次被当做“共党嫌疑犯”，如果连什么是共产党都没有弄清楚，那不是白吃这场官司了吗？虽然后来知道淮阴中学在 1927 年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但是国民党对待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不让漏网一个，共产党只能是很秘密的。怎样才能找到共产党、了解共产党呢？眼前像是一片茫茫的大海，哪里才能找到一艘航船呢？

我记住了在拘留所时跟钱御官的一次谈话。我问他“你是共产党吗？”他说他也不是，但他相信马克思主义。其实他当时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当然不能告诉我。他的话使我知道马克思主义是讲共产主义的。于是我到学校的图书馆，找了一个比较熟识的待人和善的管理员，我问：“老师！请你告诉我，有叫马克思主义的书吗？”他摇摇头答道：“没有书名叫马克思主义的书,有一本《社会科学十二讲》,里面讲到马克思主义。’我喜出望外，就向他借阅。这是一本灰色封面不太厚的书，封面上印着：瞿秋白、耿济之编译，商务印书馆出版。我起早睡晚，认真阅读。但是太难了，读不懂，只生吞活剥地记住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斗争、唯心论、唯物史观一些新名词，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书上讲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克鲁泡特金等等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还分不清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主张有什么不同。看到书上印有这些人物的头像，我就用很薄很薄的纸把这些头像描画下来，以表达我对这些人崇拜的心情。

同班同学叶舒宁注意到我，问我做什么。我说：“当了一次共产党嫌疑犯，连什么是共产主义都不知道，想了解了解。”我们就接近起来，从北洋军阀孙传芳谈到国民党的蒋介石，从对国民党现状的不满谈到国家的前途。有一次，我说：“我读过《中山全书》，曾以为三民主义可以救中国，现在蒋介石违背了孙中山的主张，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国家变好。”他告诉我，他刚从高中师范部的一个老乡（他们是阜宁人）那里看到一本书，是讲这个问题的。我急切地请他借给我看看。第二天，他在教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把一本用报纸包着的书给了我，十分郑重地叮嘱我说：“这是一本秘密的书，千万不能让别人发

现。”

我既惊喜又紧张，打开纸包一看，书的封面上印着“三民主义”“孙文题”，但这是伪装，其实内容是瞿秋白对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批判。又是瞿秋白！瞿秋白已经是我心目中敬仰的一个人。我躲在安全的地方，如饥似渴地把书读完了。这本书不像《社会科学十二讲》那么难懂，虽然有些地方还是不大明白，但是我已大致知道，国民革命的目标本来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是国共合作后发动起来的；在北伐的过程中，国民党蒋介石倒戈了，背叛了，跟帝国主义和军阀妥协，而把屠刀对着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现在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继续把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打倒，中国人民才有出路。

我如约在两天之后，又是在教室里只剩叶舒宁和我两个人的时候，把书还给他。

我兴奋地对他说：“找到出路了！我要参加共产党！”

他说：“你不怕吗？共产党被抓住是会杀头的呀！”

我说：“不怕！”脑子里一下子冒出文天祥的诗句，就背诵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他说：“那好吧。我也想参加共产党哩！我们一起去找吧。”他说可以向借那本书给我们看的高中同学问问看。

此刻，我彷徨和苦闷的心里，又迸发出希望的火花。

用革命推翻旧制度

叶舒宁告诉我，他找到共产党了，但是我们的年龄都还小，不够入党的年龄，可以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又解释说，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青团就是共产党的后备军。

我表示了迫切入团的愿望。他叫我写个申请书。在申请书里，我倾诉了对国民党的痛恨，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和对共产主义的向往，还表示了自己不怕抛头颅、洒热血的决心。

过几天，叶舒宁通知我，团组织已经批准了我的申请。我从来没有这样兴奋过。这是我人生的新的起点。母亲给了我自然的生命，共青团给了我政治的生命，我把共青团也看作是我的母亲。这时我才知道叶舒宁已比我先入团了。

这是 1930年 5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参加了全县的团员大会。这个会是秘密开的，地点在王营镇（今淮阴县）的一个小学，在城的北郊，离城有八里多路。

头一天叶舒宁通知我，要我在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到西城门外，他在那里等着我，一起走。这条路我走过几次，这一次道路依旧，心情却大不相同，路旁树上的桃、杏花更加鲜艳，天空飞鸟的鸣叫声也令人感到格外欢畅。

我们到了一所小学校里。星期天，里面没有人，周围空旷，非常安静。到了二三十个人。特别使我高兴的是，我们同班的同学就有七八个，有李献臣（后改名李竹平，八十年代任轻工业部副部长、顾问，已故）、姜劭、叶舒宁、董耀先、王其杰、王其位等。我们学校团支部书记是高中师范部的同学张寿昌，他派了一个同志在校门口看风。我们就在教室里开会。

团县委书记宋振鼎（曾是淮阴中学高中师范部的同学）做报告。他说，我们的党，我们的红军，已经在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省的边界地区，建起了好几个苏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不久以前，红军打下了安徽的寿县，离江苏已经不远了。最后他说，现在“红五月”到了，我们一定要搞好

“红五月”的活动。这些话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中国将会大变样子，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我的心情无比振奋。

会后，我阅读了党的、团的一些文件和传单（当时团员也能看党的文件），这些自然都只能秘密地阅读。我不只一次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们要破坏一个旧世界。”我想，我们怎样破坏这个旧世界呢？我现在已经是团员了，能做些什么呢？就同姜劭商量。姜劭本来在班上就是同我很接近的，在一起开了一次会之后就更加亲密。我们经过商量，就在晚上到一些没有人的教室里，砸电灯泡，抬了课桌从二楼向下扔。我们以为日积月累就会为“破坏旧世界”尽一份力量。

没想到引起学校当局的注意。团支书张寿昌也找我谈话，他说：“你是个新团员，革命热情高，这是好的。但是，不能这样盲目胡干啊！革命不能这么个革法。革命是要推翻旧社会的制度，是要靠党，靠红军，靠整个无产阶级和劳苦人民组织起来，把旧社会制度推翻。你这样胡干，怎么能破坏旧世界呢？这会不必要地暴露自己的。”我听了，知道自己错了，很难过。

“红五月”,有很多纪念日“五一劳动节”“五三济南惨案”“五四运动”“五五马克思诞辰”“五九国耻”“五二一马日事变”“五卅运动”。纪念这些节日,都要散发传单。团支部把传单分发下来，有时两人一起发，一个看风，一个散发；也有时单独发，现在看来，这完全是一种“左”的形式主义的做法，但当时我们都是狂热地去干的。

有一次，我身上揣着几十张传单，在上午将下最后一节课的时候，溜出教室，把传单散发在楼道上，楼梯上，又跑到食堂里，扣在一个一个饭碗的下面。然后我又回到教室里。

刚下课，一个校役来找我，叫我到校长办公室去。那时校长是王德林,是被我们看成“党棍”“学阀”,在学潮中反对过的。

王德林问我：“你刚才干了什么？”

我说：“我在上课。”

他并没有声色俱厉，指着办公桌旁边的一张小桌子说：“你看看那个抽屉里是什么？”

我一看，是传单，也许正是我刚散发的传单。我尽力镇定下来，若无其事地说：“这是什么？我不知道啊！”

王德林说：“你下课以前，跑出教室散传单，我都看在眼里了。”他的办公室的窗口正对着我们的教室，我相信是被他看到了，但是不能不矢口否认。

他说：“我不强迫你承认。我只告诉你，县党部，公安局，都有密探住在学校里。我看你的各门功课都很好，你要做好学生，我不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只是希望你以后再不要干这种事，好好读书。”

就在这前两天，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红军一度打进长沙的消息，我兴奋地在黑板上写了“庆祝红军攻占长沙”的大字标语，虽然是用左手写的，但是训育主任还是看出了我的笔迹，找我谈话，我也是矢口否认。

学校当局已经盯上我了，我还曾被捕过一次，我想在淮阴再不能呆下去了。我打算到外地去读书，向一些同学打听，知道初中三年级都不收转学生，只能去报考高中一年级。怎么办呢？我就向初三的同学借了几何、三角、物理学、矿物学之类的课本，上课读初二的课，起早贪晚地自学初三的课，语文这些课我不怕，主要是学数理化，准备报考高中。

1930 年上半年的淮阴中学，被一股进步的潮流所激荡。一些进步书籍和刊物如《萌芽月刊》、《拓荒者》等半公开地流传。接近期末，有些班级准备演出戏剧。初三一个班排练郭沫若的诗剧《棠棣之花》，他们把其中的诗谱了曲子吟唱：

“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苍生久涂炭，十室无一完，既遭屠戮苦，又有饥馑患。饥馑匪自天，屠戮咎由人，富者余粮肉，强者斗私兵。谁可均贫富，谁可锄强权，愿为施瘟使，除彼害群遍！”伴着箫和二胡，这一类的歌声，每到下午课余活动时间，就在教室里、校园里荡漾。我真有点喜欢上了这样的气氛，但是又不得不设法赶快离开学校。

正当这样的时刻，一个在南京读书的苏北籍姓王的学生来到学校找老乡叶舒宁他们。我就向他打听南京高中招生的情况。他告诉我，不少学校要招生，他所在的钟南中学也要招生。我又向他打听我如到南京能找到住的地方吗等等，他热情地说，他可以介绍一个同学给我安排。后来知道他和他介绍的那位同学都是共青团员。我就下决心到南京去投考高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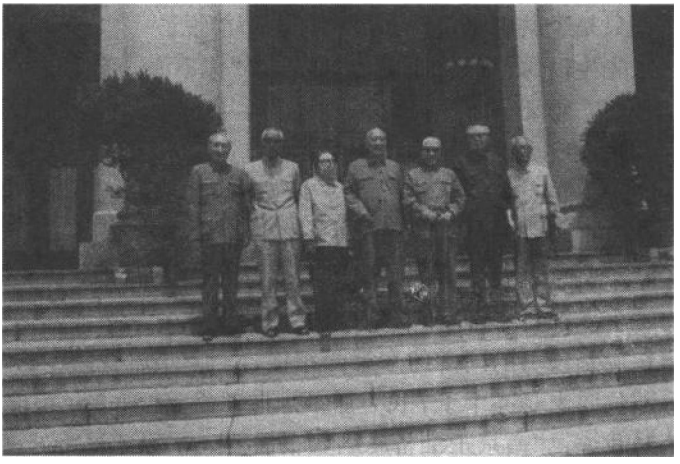
我长这么大还没有出过远门，就找家住南京的张先生，问他如回家能不能带我同行。张先生是我们班的国文教员，他有正义感并且待我很好。有一次，他看到我在作文中用了“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布尔乔亚”(资产阶级)这些新名词，把我叫到他的房里，问我是什么意思，叫我以后在作文中不要用这些名词。他说他不反对普罗文学，但在作文中这样写是会引起麻烦的，要我多加注意。他对我说话的语气是爱护的，没说完话就拿起红笔在我的那篇作文上打了 100 分。这次我提出与他同行，他高兴地答应了。

我要离开家乡，还要得到父亲的同意。我不能把真实的原

因告诉他，只是说，我已把初三的功课都自学完了，不想再留在淮阴中学了，准备到南京去考高中。他表示不放心我一个人独自远走。我就把张先生带我同行和到南京后也会有人照顾的情况告诉他。他夸了我几句“有出息”的话，就欣然同意了。

第二章　李立三、王明“左”倾路线下我的地下工作经历

好像不久南京就是我们的天下了·第一次见到丁玲印象深刻·蒋介石首先厉声指责学生行动逾越常规·警察逼母亲把我和妹妹交出来·那年月我遇到示威总是很积极



他们都参加过 1930 年的南京暴动准备工作，现在还在世的，只有三个人。
从左至右：温济泽、李竹平、徐明清、刘瑞龙、曹瑛、刘季平、黄玠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